

往事漫忆

我当通讯报道员

梁振海/文

说起通讯报道员，现在的年轻人会一脸茫然。但上点岁数的中老年朋友，如果爱看报纸的话，一定不会陌生。那时报纸主要靠各地通讯报道组投递的稿件组版，不像现在有专门在下边采访的记者。

五十年前，我在家乡生产队参加劳动，每天晚上学习时事政治。我是辅导员，负责给社员们读读报纸。后来县里有了广播站，接着工委、公社也相继成立了。每个生产大队及小队都组建了通讯报道组，我当上了大队的通讯报道员，专门负责给公社、工委、县广播站写稿。由于工作突出，公社广播站把我调去帮忙当土记者，到公社管辖的十几个村庄采写优秀人物的先进事迹等。那时，农村生活非常艰苦，一个男整劳力一天的工值，才一两毛钱。我下到各村，公社每天补助三毛钱和半斤粮票（中午在老乡家吃饭，得给人家钱和粮票）。工作虽然又苦又累，但当时自己年轻精力充沛，干劲十足。尤其是写的文章在广播喇叭里播出后，一种成就感油然而生，兴奋得我夜不能寐。

俗话说“人往高处走”，我冒出了一个新的想法：给报社投稿。这跟给公社、工委、县广播站写稿可不一样，它的稿件质量要求高，见报率还特别低。那时唐山仅有一份《唐山劳动日报》，是现在版面的四分之一那么大，且有诸多企事业单位和几十个县近万个生产大队的通讯报道员投稿，竞争何等激烈，一般是很难发表的。由于交通不便，每次去下面采访，我都要骑自行车走一二十里的崎岖山路，然后通过大队干部找人座谈做笔记，晚上挑灯构思撰写，经常熬到深夜。半年后，稿件《精心育人》终于见报了！这是我投的第十三篇稿件，我激动得如同买奖券中了头彩。找到报纸拿出底稿一对照，我



发现编辑所改处都有画龙点睛的作用，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。随后第二篇、第三篇……陆续被刊登出来，其中有一篇题目叫《在暴风雨夜里》的通讯，还被某村小学语文课上拿来学习。

这个过程中，有两件事让我终生难忘。一次是我给大伙读报纸，把“翱翔”的“翱”念成了“奔”。这时，一位年龄较大的爷爷辈的人，呼着我的乳名，指着我的鼻子说：“你回家查查字典，看看那字念啥！”我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脖子根。生产队长赶忙过来打圆场：“把那字隔过去，往下念……”我这才下了台阶。第二次是那听到的风言风语“那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做梦娶媳妇，痴心妄想……”（讽刺我往报社投稿）听了这话，我心里好像打翻了五味瓶，不是滋味。但我生性倔强，说我不行，偏要试试看。这些“激将法”对我的上进反而起到了推动的作用，此后我有了长足的进步。现在想来，我衷心感谢从正反两面激我努力的那些人。

我底子薄，只上了六年小学，因此，为了完成报道任务，必须刻苦学习文化知识。我每天白天参

加劳动，晚上生产队的学习班散了，回到家里我就在灯下读书自学，练习生字、生词，直至午夜凌晨。在那个特殊的年代，想找点学习写作的材料，简直难于上青天。但天无绝人之路，一次偶然去邻居家串门，发现了一本《怎样写新闻报道》，我如获至宝，赶紧借了过来。那里面讲了消息怎样写，通讯怎样写，新闻的五要素等等。我看到后茅塞顿开，如雾散天晴，心里豁然开朗。拿它当把尺子，衡量报纸上的文章，丝毫不差。有人说“文无定法”，其实不然。无论啥事，只要留心，那里面都是有一定的规律可循的。

后来，通过大队的举荐、公社的政审、县里的批准，我有机会走出了生我养我的那个小山村，当了一名建筑工人。

斗转星移，岁月如流。如今我和老伴都已退休赋闲在家，每月有固定的养老金，生活充实快乐，幸福美满。每当黄昏，我们老两口常常漫步在社区周围的林荫道上，沐浴在夕阳晚照的霞光里。这时，我总爱回忆往昔，经常让我想起的，还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那段当通讯报道员的时光。

流年花火

儿时的『股份制』

刘景文



1962年，我在石家庄铁路一小上学。暑假过后，我将升入四年级。

在假期过去了一大半，差不多再过两周就要开学的某天，我正百无聊赖地在家翻着不知看了多少遍的小人书，住在前排的二踩找到我，哦，“二踩”是乳名，他的大名叫“国生”，1949年生人。他开门见山地问我：“有个挣钱的机会，你干不干？”我一听能挣钱就来了劲，忙问是干啥。他指指我手中的小人书，“咱们去摆小人书摊儿吧！”

我一听泄了气，自己才几本小人书呀？满打满算也就十几本吧。我知道，二踩比我多，但我俩的加起来也超过五六十本。就这点家底儿，怎么也撑不起一个书摊儿。

二踩暑假后就升入六年级了，到底比我大两岁，办法多。他出主意说：“不会再找几个同学入伙吗？”于是我俩合计了一下，决定把经常在一起玩的小哥们儿——小林、大鹏、和泉、臭小叫到我家开个会。我的父母是双职工，家里就我一，大人们不在家，我说了算。

我们六个小伙伴凑在了一起，开了一个“股东会”。几个人都赞成合伙的建议，并且认定了“股份”。我、小林、和泉、臭小各拿出15本，各算1股；大鹏拿出30本，算两股；二踩最多，能拿出60本，一人独占4股。大家中午都把书送到我家，由我登记造册。

说干就干，刻不容缓。那天下午四点，我们几个孩子每人带上3个小板凳一起出摊儿。大家推举二踩为“头儿”，因为他的“股份”最多，年龄也最大。大家说我办事认真，让我负责保管每天赚到的钱。

就这样，我们每天下午从四点到七点，在宁安路铁路16宿舍南门口的空地上，铺上几张报纸，摆上小人书，热情招揽过路的小朋友。

我们的书摊儿实行“薄利多看”的促销方式。别人在街上摆小人书摊儿，一分钱看两本；我们这儿一分钱可以挑三本看，还提供小板凳、小马扎。还别说，每天都有小朋友来看，每天都有两三角钱进账。

转眼就要开学了，我们的“买卖”也到了“关张”的时间。我把这些分币、毛票相加，11天（其中一天下雨，实际是10天）竟获利2元7角；按“股”分红，二踩分得最多，分了一块钱，真让人羡慕死了！我分得2角6分，谁让咱的小人书少呢。分配完毕还剩几分钱，买了5个硬糖块，不够一人一块，二踩毕竟是“头儿”，姿态高，他说自己不吃，让给了我们。

拿到钱，我兴奋地跑到石家庄市中山路的新华书店专门卖连环画的柜台，买了那本定价2角2分的《东进序曲》——那是自己一直眼馋又买不起的连环画。这回好了，自己挣来的钱，花着硬气、痛快。还剩下4分钱，不够买5分钱一根的小豆冰糕，我就买了两个2分钱一根的白糖冰棍儿，以此犒赏自己。我一只手拿一根冰棍儿，左看看，右看看，成就感满满，甭提多自豪了，心里比吃了糖还甜！

老照片

50多年前的老照片

安淑清 文/供图

20世纪60年代，在铁路勘测设计院工作的父亲被派出国，去坦桑尼亚、赞比亚修建铁路。

那时不像现在，交通、通讯都不方便，父亲的行程很紧工作又忙，都没时间回家看看，只给家里寄了一封信。过了好多天母亲才收到信，看完后，母亲就带上刚会走路的我，找上亲如姐妹的印肖姑做伴，一起去看我父亲。从无极到天津，现在开车不过三个多小时，那时客车很少，火车很慢，起个大早儿也得走上一整天。我们先坐客车到石家庄，再转火车去天津。到了天津，父亲与工友却早已起程，我们怅然而归。

父亲临行没有见到我们，更是满心失望，多日旅途劳顿到达目的地后，写信要我们的照片。于是，母亲带我和姐姐拍了这张寄去。当时还没有妹妹，妈妈28岁，怀里的我两岁，身边的姐姐5岁。

不知道这张照片走了多久才到了父亲手里，也不知道它陪了父亲多少年。还有好多我不知道的，想问，却已无人可问，因为父亲已于2015年冬天离开，妈妈也在去年夏天追随他远去。二老世间携手57年，退休前聚少离多，退休后才是真正的朝夕相守。如今，相信他们在另一个世界也在一起，和以前一样看着我们，平静地过着日子。

